

文言翻译与“五四”新体白话的生成

宋声泉

内容提要 1918年,《北京大学日刊》所载的四篇译自日语杂志的文章,为观察鲁迅等人借极端欧化直译的文言语体变形转向“五四”新体白话的最后环节,提供了新史料的支撑。“五四”新体白话自言文横跨生成的关键在于逐字译的实施,同时其成分的欧化也有一条经由日化的生成途径。可惜的是,这批文学革命初期的文言译作,因匿名发表,长期消失在研究者的学术视野中,也无法为通过研究文言翻译而考察新体白话的产生提供可能性。可以这样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存在一条从胡适的理论倡导到鲁迅的文体实践之偏移的轨迹。

关键词 文言翻译;“五四”;新体白话;《北京大学日刊》;鲁迅

“五四”前后,汉语书面语发生了显著变化:不仅体现在文言到白话的转移,更重要的是创造了一种与中国旧有白话迥然有异、带有浓厚欧化色彩的新体白话^[1]。然而,长期令学界困惑的是,这种现代汉语文学书面语究竟缘何而生?这既是涉及新文学创作起源的关键性问题,也是现代文学学科需要解答的基本命题之一。目前,关于新体白话的生成,至少有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流衍、近现代“演说”的促动、西方传教士的导入、新式教育的催发和翻译语言的派生等五个维度的解释^[2]。诸家说法皆有合理之处,但理路丰富且多可开掘的是最后一种。

早在1989年,施蛰存便新奇地发现:“外国文学的白话文译本,愈出愈多,译手也日渐在扩大,据以译述的原本有各种不同的语文,在潜移默化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白话文。它没有译者的方言乡音影响,语法结构和辞气有一些外国语迹象。译手虽然各有自己的语文风格,但从总体来看,它已不是传统小说所使用的白话文。”^[3]2006年,严家炎撰文支持施蛰存的推断,亦称“五四”新体白话是“被翻译逼出来的新体文”,这构成了理解“新体白话这类重大而复杂的语言现象及其来龙去脉”^[4]的一种有效视阈。

与追认“近代白话翻译文学”为“五四”新体白话起源的思路不同,王风在2009年提出了新的阐释路径:鲁迅等人在晚清民初对汉语书写语言改

造的文言实践在文学革命时期被转写为白话,成为现代汉语书写语言的主要源头^[5]。前人研究主要是基于对新文学外部的考察展开的,均无法从根本上解释新体白话何以会在“五四”一代新文学作家手中创生,也始终难以有效地回答“鲁迅在创作后世所谓新文学开山的《狂人日记》之前从未发表过纯粹的白话作品,那如此特殊的语体是怎样形成的?”这类问题。王风新思路的独特性在于横跨语体来讨论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写”问题,以及蕴含在这一视野中的凸显两者连续性的学术理路。

鲁迅等人借文言实践实现了对汉语书写语言的改造,而这一改造的背后是翻译行为的诱发和促动,由他们的文言翻译入手,正可敞开“五四”新体白话生成的研究空间。只是王风的研究重心在晚清,所考察的源语文本主要是英语,对译自日语的文言译作观照不足,因此“改造过了的文言被‘转写’成白话”这一核心环节仍不够显豁,颇可遗憾。

所幸1918年《北京大学日刊》上留下了鲁迅与周作人的四篇未署名的文言译作:《进德会报告·北京大学之进德会》《进德会报告·廓清会起于支那》《莫利逊文库》和《美国人之支那书蒐集》。这批文学革命初期的文言译作虽看似文学性不高,却因处在《新青年》同人白话转向的关键时刻,负载着相当丰富的事件内核,倘若能释放其间蕴藏的信息,便可以呈现文学革命初期以文言用于直译所

能达到的极致及通向新体白话的可能，以此为勾连文言翻译与“五四”新体白话的生成，提供一个切实而典型的个案。

一 蔡元培“属译”考

1917年是周作人自认的“大转折”^[6]之年。他放弃了作为书写语言二十余年的文言，转写白话文。周作人明确说1917年到北京后所译梭罗古勃的十篇寓言是他“最后的一种文言译品”^[7]。但吊诡的是，在《新青年》同人文学变革主张日趋激进的1918年，周作人竟用文言翻译了五千余字的《废娼问题之中心人物》，而这又被他后来“遗忘”了。

1918年的周作人在担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的同时，还兼北大国史编纂处纂辑员。校长蔡元培时常会请他翻译文章。首次是2月19日交其“《大学评论》一本，属译”；2月23日，周作人便交回“译件”^[8]。隔天，《废娼问题之中心人物》开始在《北京大学日刊》连载，署名“周作人”，并注明来源“本年一月《大学评论》”^[9]。显然，周作人此译是为了完成蔡元培交给的任务^[10]。

《废娼问题之中心人物》题目下标“进德会译著”。蔡氏托译该文，有其用心。蔡元培作为北大进德会的发起人，始终积极推动该组织的发展。译油谷治郎七之作，是从声势上呼应进德会的主张——成为进德会甲种会员首要标准就是“不嫖”。

不少研究者以《废娼问题之中心人物》作为分析周作人“五四”时期思想的重要文献。然而，如此处理并不恰切，忽视了该文并非他主动择取之译。该文译出不久，周作人又译了“日本第一女流批评家”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并称许她“极进步，极自由，极真实，极平正”；而该文的重要观点是“道德这事，原是因为辅助我们生活而制定的。到了不必要，或反于生活有害的时候，便应渐次废去，或者改正”^[11]。由此，不难体察周作人的伦理立场与进德会之间的龃龉。

1918年3月，蔡元培又屡次“属译”，周作人日记记录如下：

十三日 得蔡先生函，《日支时论》一本，属译。

十五日 上午往校，访蔡先生，还德文美术史，致译稿。

十八日 晚得蔡先生函及《廓清》一本，属译。

十九日 上午译《廓清》中文一篇了。

二十日 访蔡先生，交译件。

廿七日 晚得蔡先生函并《支那》一本，属译。

廿八日 上午译《日支时论》文，至下午二时半了。

三十日 上午往校，交蔡先生译件。^[12]

从中可以确证，周作人译了《廓清》《日支时论》上的文章，但问题是3月15日已将《日支时论》译稿交给蔡元培，因何28日又“译《日支时论》文”？而蔡元培27日属译之《支那》是否完成？30日所交究竟是《支那》还是《日支时论》的译稿？迄今为止，这批译件的具体情况尚未被揭示^[13]。

幸而对《废娼问题之中心人物》的还原，可为清理这些纠缠的问题，提供初步线索。经仔细查阅，笔者在1918年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发现了四篇译自蔡元培交付的三种日语杂志的文章，即：3月16日译自《日支时论》第四卷第二号的《进德会报告·北京大学之进德会》；3月21日译自《廓清》第八卷第三号的《进德会报告·廓清会起于支那》；4月17日至22日译自《日支时论》第四卷第二号的《莫利逊文库》；4月23日至26日译自《支那》第九卷第六号的《美国人之支那书蒐集》。

易于证明的是，两篇《进德会报告》出自周作人。从时间上看，3月15日交《日支时论》译稿，第二天《北京大学日刊》上便载出译自《日支时论》的《进德会报告》；3月20日交《廓清》译稿，21日“日刊”亦登有译自《廓清》的《进德会报告》。这种交后即发的情况，与《废娼问题之中心人物》一致^[14]。从内容上看，两篇报告是日本有关蔡元培的报道。这两份来自海外的回应，对于迫切希望推动进德会建设和增大其影响的蔡元培来说，正是可借以鼓吹的有力资源。

尤可分析的是两篇报告的译者案。针对《北京大学之进德会》文末“记者揭载此文之意，并非欲强日本绅士诸君废绅士业是也”的话，译者评道：“此节盖含讽刺之意，日本所谓绅士业者，作官作议员而外，不肖者益以冶游蓄妾，唯少赌博而已。”

能够读出并译出原文中的幽默与讽刺，需要对当时的日本情况有一定的了解；且为保存原文味道、不惜以案语说明而不径改的方式，也是周作人在翻译中始终坚持的。

《廓清会起于支那》的日语原文曾引蔡元培所撰《趣意书》“入会之条件（三）”，但转译时被改为“斯くの如き過ちは誰にでもある事であらう。乍併過去は責めない、ただ將來を戒めて行きたいのである”。中文译者将之回译为“如是之过，人恒有之，唯既往不咎，但戒将来而已”。其后案语称，“此引进德会规则第三条，今但照原文直译”。蔡元培的《趣意书》就发表在1918年1月19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很容易查找。译句原文为：

本会不咎既往。《传》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凡本会会员，入会以前之行为，本会均不过问（如已娶之妾亦听之），同会诸人均不得引以为口实，惟入会以后，于所认定之戒律，有犯者，罚之。

可见，日文在介绍时只是概述，已与蔡氏原话相差太远。译时不免两难：直译将改蔡氏原句，不直译便改原文的语气和面貌。周作人宁施以案语说明情况也要执着于直译，这样的翻译观念及其实践在当时的译界是极少见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以往研究一般认定《新青年》同人最早提到“直译”二字的文献是周作人写于1920年的《〈点滴〉序》，但其实早在1918年《廓清会起于支那》的案语就已被使用。两份报告确为周作人所译，但分别附在译文前面的两则以进德会口吻发布的消息，则更可能是蔡元培的手笔。

两篇《进德会报告》的考订为后续探讨提供了基础。1918年3月15日，周作人交译稿但并未奉还杂志，28日再译的《日支时论》仍是第四卷第二号，与《北京大学日刊》所载《莫利逊文库》之出处吻合。需要说明的是，该文的选译或许并非出于周作人自身的意愿。他日记中常常记有其得书与读书的情况，从未有《日支时论》的阅读记录；且当时他的兴趣点在欧洲文学名作与国外出版的与之相关的学术著述方面，对中国古籍的话题不甚留意。

《莫利逊文库》也应是蔡元培所托。他向来

关注与中国相关的国外学术状况，如1918年2月20日日记载“本日《晨钟》有《外人之中国调查研究机关》”^[15]。至于1917年“莫利逊文库”流卖东洋之事，深为当时中国知识界所痛心。张謇等人曾积极奔走，希望能将莫利逊长达二十年收集的关于亚洲特别是中国的西文书籍留在中国，但文库最终卖给日本岩崎久弥男爵^[16]。《时报》报道消息后不久，胡愈之撰文说：“关于中国事件搜罗若此因富之藏书，华人不能自购，坐令人于日人之手中，诚足为华人惜矣。”^[17]该事或也让蔡元培心有所感。

关于《莫利逊文库》，仍应解答的是：为何该篇的发表速度与前几篇不一样，没有交后即刊，而延后半月。就在周作人“交蔡先生译件”的3月30日当天，《北京大学日刊》刊发《本日报经理部启事》，称“四月一号至七号为春假之期，八号又为国会开幕纪念日。本日报照章停刊，九号仍照常出版，特告”。算上3月31日，休刊九天，造成了稿件的积压。发表虽不似两篇《进德会报告》那般迅速，但考虑到停刊之事，也能在时间上显示周作人所交译件与《莫利逊文库》的关联。

考订了周作人的三篇集外译作之后，似可顺理成章地推断蔡元培“属译”《支那》上的文章应该就是登于日刊、译自《支那》第九卷第六号的《美国人之支那书蒐集》。该文的连载时间与《莫利逊文库》无缝衔接，所发栏目也相同。且自3月31日至4月中旬起两篇文章接连发表的这段时间，周作人日记再无交蔡氏“译件”的记载。由此可知，周作人3月30日最后交给蔡氏的“译件”应为两份译稿。是否蔡氏看到《美国人之支那书蒐集》后回想《日支时论》所载与之关联的《莫利逊文库》，遂托周作人一并译出？或许不是没有可能的。这也可解释何以周作人27日“晚得蔡先生函并《支那》一本，属译”，第二日上午却莫名其妙地“译《日支时论》文”，直至“下午二时半了”。

二 鲁迅代译考

从发表的事实上看，周作人完成了蔡氏任务。然而，周作人是否就是《美国人之支那书蒐集》的

译者？这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考证的问题。他翻译其它受蔡元培委托的文章时都有记录，唯独这篇失记。不过周作人3月27日晚得杂志后，日记中载有“起草至十二时睡”^[18]，此“起草”文会是“属译”之作吗？

周作人1917年9月正式受聘北大文科教授，至1918年6月初步完成授课讲义。通观他这段时期的日记，可知“起草”二字有特殊所指——编写讲义。在这大半年的时间里，周作人把主要精力放在备课上。他后来在《五四之前》中坦言，“才从地方中学出来，一下子就进到最高学府，不知道如何是好”，最苦恼的是“中学是有教科书的”，但大学里需要自己编写课程讲义，“那便是很繁重的工作了”；一周要上两门外国文学课程，“事先却须得预备六小时用的讲义，这大约需要写稿纸至少二十张，再加上看参考书的时间，实在是够忙的了”。于是在白天里把草稿起好，到晚上等鲁迅修正字句之后，第二天再来誊正并起草，如是继续下去，在六天里总可以完成所需要的稿件，交到学校里油印备用”^[19]。因此，这段时间的周作人日记中频繁出现“起草”“录稿”“抄了”等字样。

且从当时日记的行文习惯来看，周作人对其翻译的作品会明确以“译”字标示。1918年上半年，除完成蔡氏所托，周作人凡译3篇，即《童子 Lin 之奇迹》《皇帝之公园》《贞操论》，无一例外，均可在日记中找到对应，分别是1月21日“晚译ソログーブ小说一篇”、3月6日“晚译クープリン《皇帝之公园》一篇”、3月31日至4月1日“译「人及ビ女トシテ」中文……译前文了”^[20]。对待自己选译的篇章，周作人都会详细注明，有的列出原作者，有时还直接标明译题。下半年所译十余篇也都如此，几乎没有例外。但对于《美国人之支那书蒐集》，周作人日记中并无任何翻译的记录。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两篇相继发表的译文中存在译词习惯的差别。首先是公元纪年的译法明显不同。《莫利逊文库》一律将原文“一八九七年”“一四八五年”对译为“千八百九十七年”“千四百八十五年”的格式。这与周作人在《废娼问题之中心人物》里处理公元纪年的译法一致。可是《美国人之支那书蒐集》原文里的

“一四〇九”“一九〇〇”“一九一二”“一九一四”等均在译文中维持原样。其次，《美国人之支那书蒐集》里出现的将藏书卖与岩崎氏的“モリソン”博士竟然没有译成“莫利逊”，而改译为“摩理逊”。

面对这些差别，很难让人相信二文出自一人之手。何况周作人28日译《莫利逊文库》，30日上午交译件，也就是说，仅29日能译《美国人之支那书蒐集》；两日之间，竟出现如此难以理解的差异。粗心、笔误或手民之责诸说也难以说服人。更合理的解释当是译者各有其人。

笔者推断，代笔译出《美国人之支那书蒐集》的应是鲁迅。1918年，鲁迅一直在帮周作人修订讲义，在其疲于应对之时为之代译，并不令人意外。这一时期，周作人异常辛苦。1917年9月22日至25日，周作人为首次登台北大准备讲义，27日“寄讲义二种，予文科教务处付印”，用于10月1日的讲授^[21]。讲义从周作人编写、鲁迅修正、寄予付印到发给学生，前后仅一周左右，各环节必须紧密衔接，否则将影响教学。事实上，1918年2月18日，周作人就“因无讲义未上课”^[22]。大概许多文科教授都出现过类似情形，故而陈独秀不得不发布公函，呼吁教员“诸君写定之讲义，希早日赐下，以便付印”^[23]。

在蔡元培屡屡托译的1918年3月，周作人格外忙碌。1918年3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发“校长布告”，称“顷学长会议议决，暑假后全校各种讲义一律停发”；陈独秀亦在同期登出《文科教员注意》：

本校废止讲义，已有定议……惟学生所需参考及教科用书，不可不预为准备。……于五月一号以前交由敝处，送本校编译会审定，出版发卖，以为学生教科及参考之用。

上一周赶制下一周讲义已经让周作人叫苦不迭，而暑假后“讲义一律停发”无异于釜底抽薪，逼他两月之内必须完成两门课程讲义，送交审定出版。尽管周作人全力以赴，但仍拖到了5月28日才“编两种讲义讫”^[24]。四个多月后，其中之一的《欧洲文学史》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除费力编写讲义外，周作人每周上课六小时，隔周参与研究所小说组讨论，有时要担负学术演讲

之任务；作为《新青年》同人，常与钱玄同、刘半农等长谈，亦负供稿之责。1918年上半年，周作人总是要忙到深夜12时方能休息，甚至更晚。在蔡元培“属译”《支那》的当晚，他准备讲义到“十二时”，第二天钱玄同到访，谈到夜里“十二时”方离开，但周作人仍不得不“续抄讲义至一时睡”，且“久不能寐”；一觉醒来，上午到校办事，下午参加国文研究所小说组的活动^[25]。与周作人的诸事繁杂相比，鲁迅的1918年3月可谓清闲，从其当月日记里可见一斑^[26]，完全有时间和精力来代译。

由日常因素分析鲁迅代译的可能性后，仍需进入译文内部寻找更为坚实的文本证据。首先看《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4月25日、26日所载《美国人之支那书蒐集》的两条译者按。前文讲：“清代亦有帝室图书馆，与历代同，大集图籍。一九一二年，目录告成，其书大抵由学部大臣采自姚氏及邱氏，将来当为支那之模范的及代表之图书馆也。”译者即插按语“此误以四库书与学部图书馆书为一事”。后文说到《永乐大典》在1900年义和团事件后“仅存一万一千一百册，其中完全者十之二，即只二百册内外而已”。译者又立刻纠正说：“燹后残本当无如是之多，若为万余册，则十分之二，亦当有二千册也。此盖误。”两处按语表明译者对中国古籍及图书存藏了然于心。

民国后，鲁迅长期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职，主管的业务范围就含有图书馆事项。他亲身参与了按语中“学部图书馆”（又称京师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的改组、迁馆、建立分馆等方面的工作。尤为巧合的是，按语所涉“四库书”和《永乐大典》也都与鲁迅相关。特别是他见证了《永乐大典》残本由个人转至京师图书馆的过程^[27]。据1912年京师图书馆档案中的教育部函件可知，《永乐大典》残本“仅余六十四本”^[28]。从按语的指谬看，译者显系知晓内情。这也将译者身份指向鲁迅。

其次，可由“摩理逊”的音译入手。1912年，George Ernest Morrison受邀为中华民国政治顾问，《时报》《申报》《大公报》等常登有关他的消息，一般称其“莫利逊博士”或“莫理逊博士”（也有译作“莫理循”）。至于“摩理逊”的译法在民初相当生僻。然而，鲁迅十分偏爱以“摩”字译音，早

期作品尤多，如《月界旅行》《斯巴达之魂》里的地名“拔尔祛摩”“摩利逊之湾”，《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中的人名“摩契阿威黎”（Machiavelli）、“摩格那思”（A. Magnus），《人生象数》内的专有名词“企摩堪”（Zymogen）、“诃摩堪”（Chomogen）^[29]。举凡“ma”或“mo”的拼写，大都译作“摩”，少有例外。“五四”时期，鲁迅译《工人绥惠略夫》时亦出现“玛克希摩跋”（Makhslmova）^[30]。在《支那》日语原文中，Morrison写作“モリソン”，鲁迅后来曾分别将“モリス”译为“摩理思”、“モリソン”译作“摩理孙”^[31]。这一译音的习惯进一步支撑了鲁迅代译的可能。

以上诸种，都指向了一个结论，即：《美国人之支那书蒐集》一文的译者应为鲁迅。

三 “逐字译”^[32]的文本实践与 文言语体变形

清末民初以意译为风尚，而出版于1909年的《域外小说集》在时流中独树一帜，在其序言中明确标榜“逐译亦期弗失文情”^[33]，学界向来视之为鲁迅与周作人“直译”的开端。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域外小说集》中两位译者的语体风格“自身就不尽一致”，鲁迅毫不忌讳于“新造”和“硬造”，逐句甚至逐字译；周作人却青睐骈散夹杂的雅致，不惜删饰原文^[34]。何况同是所谓“直译”，逐句译偏于内容上的直译，逐字译更多是表达上的直译。对于新体白话生成，逐字译的作用最为突出。以往研究多以同质化的眼光打量他们早期的翻译，但事实上在大致相同的翻译理念下，二人的译语风貌另有差别。

鲁迅与周作人“五四”前的“直译”实践有着明显的阶段性与时间差。早在1903年，鲁迅所译《月界旅行》的前五回中就有不少逐字译的句子，至1906年的《造人术》也大体是逐字译，《域外小说集》里的三篇同样是逐字译；而周作人1904年译其第一篇习作《侠女奴》时，受学堂英语教育的影响，已有逐字译的取向，但随后开译的《玉虫缘》和《荒矶》在不通日语的情况下，以日译本为中介，开始追求妥帖的汉语文章的感觉，这种“信”“雅”

兼求的标准延续到了《域外小说集》^[35]。

鲁迅《域外小说集》时期的逐字译主要与其德语水平不高、不得不借助字典完成有关，但1913年已自觉奉“循字逐译”^[36]为信条，以《艺术玩赏之教育》为例：

即ち我々が幼少のときから経験する所の造形美術は手法上の関係から多くは形態又は輪廓を重視して居る。^[37]

吾侪自幼年所经验之造形美术，以手法上之关系，每于形态轮廓，多所重视。^[38]

鲁迅虽化长为短，但“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39]，不似周作人般“增减字句”以求“成章”^[40]，故译语有独特之涩味，而文字的背后是欧化的文脉逻辑。自民初到文学革命以后，鲁迅翻译日文的方法几乎是一以贯之的。

与鲁迅不同，一直到1914年前后，周作人的译文仍多是内容上的“直译”，而非表达上的“直译”。如周作人所译之《游戏与教育》：

小兒の生活に遊戯の分子の多い事は、一寸小兒の有様をみればすぐわかる事で、今更云ふ迄もあるまい。^[41]

小儿生活中，游戏一事占其大半，苟视小儿行动，即可知之，无待繁证。^[42]

这里用的就是周作人自述的文言译法，“一整句还他一整句，意思完全，不减少也不加多”，但“要凑得像妥帖的汉文”^[43]。于是原本关系复杂的长句被拆成了含义明了的短句。然而，倘若始终如此，文言译语绝不会走向新体白话。因此，新语体横生成的关键在于逐字译的实施。

有意味的是，就在周作人受钱玄同影响转向白话的1917年，他的翻译也开始回归《侠女奴》式的逐字译。首次白话译出的《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便被旧派攻击“不通”，谓为“断断续续，文气不贯，无从讽诵”的“蹇涩之译笔”^[44]。试看“倘使世间真有‘俄祸’，可就是俄国思想，如俄国舞蹈、俄国文学皆是”^[45]一类的句子，确有初试的生涩。可耐人寻味的是其译文尚可用不够圆熟的白话，但“译者案”却仍以文言撰写。由此可看出，域外源语文本提供了练习白话书写的基础框架。

就在周作人自撰白话尚力不从心之际，蔡元培

的“属译”陆续到达。《废娼问题之中心人物》延续了《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的翻译思路。不过后者译自英语，译者主动发挥的空间颇大，还原为汉语白话的难度也较大；而前者译自日语，大量汉字可参用，易于把逐字译推向一种极致的可能，如：

是人以防止凡文章绘画照象能兴起猥褻之情者之輸入发行为毕生事业^[46]

彼は淫猥なる情を刺戟するが如き有ゆる文章繪畫寫眞の輸入發行を防遏するを以て畢生の事業とし^[47]

周作人将日语长句完全对译成了汉语长句，虽以汉语语法顺序加以改造，但拒绝了古文的行文习惯，把多个层次的意思串联叠加在一句之中，语气不加停顿。当实在难以写出长句译文时，亦将原文拆分，但努力使句子的组织严密化，脉络清楚，如：

尚有千九百十年所立之团体，曰社会廓清国民十字军，于社会之纯洁保持，即所谓廓清运动，深所努力。各种势力，遂俱向此目的而集中^[48]

尙千九百十年に創立されたる社會廓清國民十字軍なる團體は社會の純潔保持、所謂廓清運動に努力し此の目的に向つて各種の勢力を集中するに到つた^[49]

此类译语已与鲁迅民初保持涩味的译文相当接近。

日刊所载两篇《进德会报告》与《废娼问题之中心人物》在译法上高度一致。这也能从文本内部证明它们出自周作人之手，如下：

(1) 下所译载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氏所发起北京大学进德会之趣意书及其规则。……不特可知支那有识者阶级之社会道德观及对于社会改良之意见。^[50]

左に譯載せるは、北京大學總長蔡元培氏の主唱の下に設けられたる北京進德會なるもの、趣意書と其規則である……支那の有識者階級の社會道德觀及び社會改良に關する意見を覗ひ得らるゝのみならず。^[51]

(2) 窃思此进德会之起，确为支那对于现代道德及政治上自觉之一机运……即在支那亦已起有此种运动欲挽顽废之风俗。^[52]

惟ふに此の進德會の起つたといふ事

は、確に支那の現代に於ける道德及び政治上の自覺の機運を覗ふ事が出来るのであつて、……支那人でさへ斯様な運動を起して道義の頹廢を救済しやうといふ心持になつてゐる時に。^[53]

以上中文句子均为日式长句，且都是逐字译，句序亦无颠倒，甚至为完全保留原文的语序特征而不惜拆散汉语的固定表达文法。

总体上看，《莫利逊文库》类似长句不多，但它日语原文里本就较少修饰复杂的句式。其涨开文言译语的逐字译更多体现在长定语的频繁使用。从语言形态来说，日语用言及大部分助动词有形态变化，利用其连体形，易于由几个句节、词组甚至完整的句子构成很长的定语，汉语的形容词、动词构成定语时则没有形态变化，只能以其在句中的位置和个别虚词来表示，不宜构成冗长的定语。并且日语中，一长串具体解释、说明或描写、叙述性质的定语，常常置于被修饰词语之前，而汉语中则或将其独立成句，或作其它句子成分处理^[54]。因此，日汉翻译中的长定语或复杂定语问题成为困扰翻译家的一个难题，今人一般选择拆译，周作人却为了忠实原文，牺牲了汉语表达习惯，类似例子在《莫利逊文库》中颇多，如：

A. 小者有长仅一二寸之袖珍本、新闻杂志之剪片

小さなものでは二寸一寸位の豆の様な袖珍本や新聞、雑誌の切抜等に至り

B. 麦加纳公使随员画家亚力山大墨笔之支那风俗图集

マカートネー卿に附いて来た畫家アレキサンダーの支那風俗図集

C. 又如英国政府提出于议会之“蓝皮书”
英國政府が議會に提出する所謂「青書」
の如き^[55]

引文的划线部分均为破坏古文行文流畅的复杂定语，尤其是B句，读来拗口。细析其结构，则是长的同位语修饰中心语“墨笔”作为其后“支那风俗图集”的定语。A、C句分别为偏正短语、主谓短语作定语。

清末民初，时人翻译意在介绍的应用文章时，

普遍会采取归化的方法简化内容；但周作人为了逼近原文，却不吝笔墨，如：

A. 凡英法德俄意西葡瑞波匈希腊芬兰等文所著，关于支那本部朝鲜满洲蒙古西伯利亚新疆俄属中央亚细亚西藏安南东部印度菲列宾群岛著述。

B. 满铁会社通济隆公司各地游览公会发行之旅行指南及名胜志。

《莫利逊文库》译文里大量如此怪诞的句子形象，亦源于不加简省的逐字译；A句不厌其烦地抄译原文举出的国名，B句因对译导致异常缠绕。这里竭力保存原作的语言条理，固守原文的态度非常鲜明。

按说应付差事，以文言出之，速度最快；以周作人的经验来说，用《域外小说集》式的方法会更快，即“先将原文看过一遍，记清内中的意思，随将原本搁起，拆碎其意思，另找相当的汉文——配合”，但他放弃了“非增减字句不能成章”且“近雅而似达”^[56]的文体，而选择了与白话译《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一样的逐字译，将文言语体变形推向极致。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在1914年前后从日文译出时还多贴近汉语表达的习惯，但1918年的日译却陡然而变。这背后折射了周作人白话转向的思虑，甚至不妨说他有借助日汉翻译来掌握白话的打算。周作人在不懂日语的时候，已经可以从日语里借汉字来翻译。他的《侠女奴》是借用英和辞典的汉字，而《玉虫缘》《荒矶》是借用日英双语读物翻译的。从日语源文本取材来打造自己的译语面貌，对他而言，可谓轻车熟路。

当着意于白话写作的时候，周作人回归了逐字译。表面上看是文言语体形式的变迁，实则为内在语言逻辑的更替。汉语的欧化除了直接来自西语俄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经过日文传递的，甚至有不少是直接来自日文的。日语对汉语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借词的方面，也包括语法及文体的部分。因为明治时代的日文同样受欧洲语言的影响，特别是明治20年（1887）以后，日文里真正导入了欧文直译体，而明治后期恰恰是清政府大量派遣留日学生的时期^[57]。周作人也是在这一时期到日本留学。他借日语文章尝试逐字译的实践，也可提示“五四”新体白话的欧化成分有一条经由日化的生成途径。

有趣的是,此刻的周作人在坚持“改头换面”的异化翻译之路上走得显然更远。1918年,面对读者质疑,周作人在公开信中说“六朝至唐所译释教经论文体,都与非释教经论不同,便是因为翻译的缘故”,明确提出译文风貌要与创作有别;他追求的是“当竭力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58]。

至于《美国人之支那书蒐集》,鲁迅仍延“循字逐译”的译则,在保持源语语序和意思的基础上,把日语句子结构的不同成分分别表达为短句。因此,该文的译语形象与其1913年前后变化并不明显。

总的来说,《北京大学日刊》所载这批文学革命初期匿名发表的文言译文,借助逐字译的方式完成了与欧、日语言逻辑的对接,从而呈现了改造汉语书写语言的新的可能。新考订的四篇集外译作,为观察鲁迅等人借极端欧化直译的古文语体变形转向“五四”新体白话的最后环节提供了新史料的支撑。正如王风指出的那样,在鲁迅等人手中,“对汉语书写语言的改造在文言时期就已经进行,因而进入白话时期,这种改造被照搬过来,或者说,改造过了的文言被‘转写’成白话”^[59]。看似横空出世的新文学的新体白话,实际上渊源有自。

四 文言翻译与新体白话

值得追问的是,同以文言语体译出的《废娼问题之中心人物》署了真名,但后面的四篇因何选择了匿名发表?考虑到《废娼问题之中心人物》的意旨乃至进德会的主张,与周作人的真实立场有一定距离,他不愿署名也可想而知;甚至不排除是蔡元培在安排《废娼问题之中心人物》发表时替他署了“周作人译”,而后才有周作人似在表明心志的《贞操论》的紧急出手。可是《莫利逊文库》和《美国人之支那书蒐集》,不涉及思想龃龉的问题,却也未署名。这便要考虑翻译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

这四篇文言译作的发表恰在新文学运动的文白之争趋于激烈之时。“王敬轩”对文学革命的抨击,虽为钱玄同杜撰,但并非无根之木,时间

也正是1918年初。是时亦《新青年》杂志同人意识增强的初始期,自第4卷第3号始,《本志编辑部启事》公开宣告:“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该号的出刊时间恰巧是这四篇译出的1918年3月。作为《新青年》杂志的同人,保持与白话倡导一致的文字,似乎也是职分所在。然而,毕竟只是为完成任务,又处于忙碌中,以文言译比用纯粹白话更加便宜,也更适合《北京大学日刊》这一发表空间^[60],因此,匿名实为上策。

然而,匿名的存在同时也遮蔽了考察文言翻译通向新体白话的可能性。在当时的文学革命语境中,“用古文译书,必失原文的好处”^[61]是面向公众鼓吹的同人共识。刘半农借回击“王敬轩”,列出了林纾译外国文学的三大弊病:择稿不精,谬误太多,“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这篇《文学革命之反响》同样刊在《新青年》第4卷第3号。《北京大学日刊》上的系列译文显然不合时宜。比对源语和译作来看,《新青年》同人所批驳的文言其实完全可与白话一样做到“中不像中,西不像西”的“直译”;所谓对林纾以古文无法正确翻译的批判,是话语的策略。

时过境迁之后,周作人直言当时攻击文言并非自己真正的判断。他在《国语文学谈》里说:“五四前后,古文还坐着正统宝位的时候,我们的恶骂力攻都是对的,到了已经逊位列入齐民,如还是不承认他是华语文学的一分子……这未免有点错误了”;“讲国语文学的人不能对于古文有所歧视……白话文学的流派决不是与古文对抗从别个源头发生出来的”^[62]。周作人在“五四”后能够适时调整语言策略,与他文言逐字译时的深层体味分不开。

再看鲁迅,尽管在汉语欧化方面不惜走向“硬译”,但1931年,当瞿秋白批评严复时,鲁迅委婉地否定了他所说的“古文的文言怎么能够译得‘信’”,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中称严氏《天演论》之后采用唐人译经之法——“以‘信’为主,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63]。这也投射出对自己曾以文言“循字逐译”经验的未能忘怀。

对文言翻译的丰富性做去蔽式的还原,更可敞

开从文言译语到新体白话的研究空间。研究“五四”新体白话生成，应将西方传教士、清末民初通俗文学译者、晚清白话文运动、汉语现代化历程等多维度综合考量，但必须由作为《新青年》同人的鲁迅等人正面进入。他们是新文学欧化白话定型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关键人物。

刘半农曾说：“语体的‘保守’与‘欧化’，也该给他一个相当的限度。我以为保守最高限度，可以把胡适之做标准；欧化的最高限度可以把周启明做标准。”^[64]虽然刘半农这里未提到鲁迅，但钱基博却将“周树人”做了靶子。钱氏将新文学的白话文运动分为两派：“写以中国之普通话，而文言杂厕在所不禁”的“胡适辈”和“摹仿欧文而溢之曰‘欧化的国语文学’”的“周树人”。在他看来，国语文学的欧化“始倡于浙江周树人之译西洋小说，以顺文直译为尚，斥意译之不忠实，而摹欧文以国语，比鹦鹉之学舌，托于象胥，斯为作俑”^[65]。暂不论钱基博批评话语的偏见程度，从其对白话文运动的分野来看，亦能说明《新青年》内部白话生成径路的差异。

有识者追问：“‘新文学’号称以白话代文言，而白话一千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凭什么说这时候才‘代’？当然可以说这时的白话与古代的白话不同，但那究竟又不同在哪儿？”^[66]中国旧有白话偏于口语，书面文章基本都是文言。晚清白话文运动以白话成文，主要是俯就下层百姓，“那时候，古文是为‘老爷’用的，白话是为‘听差’用的”，因此“写正经的文章或著书时，当然还是作古文的”；但“五四”白话文运动希望达成的是“无论对什么人，做什么事，无论是著书或随便写一张条儿，一律都用白话”^[67]。但问题是，写便条的白话不妨从口语里来，而著书的白话却难以由此实现。

清末民初时期，对于从小读古书作古文的这一代作家来说，“采用文言简捷便当，一挥而就；采用白话反而劳神费心，‘下笔之难，百倍于文话’”^[68]。在吴语方言区长大的鲁迅亦如此。鲁迅译《月界旅行》时初拟“以俗语”，最终却因白话经验不足而改弦更张^[69]。周作人也将“写古文难，写白话容易”视为“误解”，称“据我的经验说却不如是：写古文较之写白话容易得多，

而写白话实有时是自讨苦吃”^[70]。因此，白话如何文章化是新文学建设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在文学革命中，白话文运动最初的主导者是胡适。他放言“死文字”的文言不能产生“活文学”^[71]，但鲁迅并不认可这种二元对立的看法。在《门外文谈》里，鲁迅将古书里的童谣、谚语、民歌、宋人语录话本、元人杂剧传奇里的科白统统看作“当时的口语的摘要”，“是古人的文”而非“俗语”^[72]，这显然否定了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观。

胡适倡导的所谓“活语言”的白话是“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73]，但真正打开新体白话局面的，于创作方面是鲁迅，于观念层面是周作人。鲁迅《狂人日记》发表后，在当时没有引起语体话题；反倒是周作人的翻译，屡遭旧派诟病。周作人最初的两篇白话译文《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和《古诗今译》均未能幸免，特别是后者被讽为将“全副精神肚脏都搬运到中国文字里头来”，弄巧反拙，“中不像中，西不像西”；而胡适的白话译诗《老洛伯》却得到反对派的肯定，认为“狠可以读”^[74]。可见，倘若仅是胡适式的白话，不会因新异怪诞而导致激烈的反弹，白话讨论的社会效果也会因此而打折扣，更重要的是无法建构新文学独特的语言形态和身份特质。

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里回顾了1918年的文学革命，认为在“欧洲新文学的提倡”方面，“周作人的成绩最好”，因为“他用的是直译的方法，严格的尽量保全原文的文法与口气。这种译法，近年来很有人仿效，是国语的欧化的一个起点”^[75]。倘若承认“五四”新体白话的核心特色在欧化因素的话，那胡适的评价恰恰说明了以鲁迅等为代表的留日派《新青年》同人的特殊性与重要性。

“五四”白话文运动事实上存在一条从胡适的理论倡导到鲁迅的文体实践之偏移的轨迹^[76]。1919年初，傅斯年呼应胡适主张却有感于旧白话粗鄙无文，称“我们的说话，本不到第一等的高明；就是把它的好质素通身移在作文上，作出的文，依然不是第一等。仔细观察我们的语言，实在有点不长进：有的事物没有名字，有的意思说不出来；太简单，太质直；曲折少，层次少”^[77]。这与

鲁迅的想法如出一辙。鲁迅在《玩笑只当它玩笑（上）》中评“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时说：“要说得精密，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得采些外国的句法。”^[78]从语言的内蕴看，鲁迅的《狂人日记》确实比胡适的《蝴蝶》更具现代质感，诚如张定璜所言：“读《狂人日记》时，我们就譬如从薄暗的古庙的灯明底下骤然间走到夏日的炎光里来，我们由中世纪跨进了现代。”^[79]

胡适范式不过是激活本土白话小说的旧有资源，难以在语言转型上开辟新的天地，于是傅斯年将周作人在《新青年》上所译之小说视为理想而典范的白话文，称“那种直译的笔法，不特是译书的正道，并且是我们自己做文的榜样”。他提出了白话文章化的“欧化”路径，并点明了写白话文章的具体方法，即“练习作文时，不必自己出题，自己造词。最好是挑选若干有价值的西洋文章，用直译的笔法去译他；径自用他的字调，句调，务必使他原来的旨趣，一点不失。这样练习久了，便能自己做出好文章”^[80]。

借助《北京大学日刊》所载之系列文言译作，可揭示由“竭力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的文言逐字译最终形成其逻辑严密而富于组织性的新体白话的过程。逐字译实现了文言作为内在资源助力新体白话的生成。由此可理解，何以说鲁迅等人晚清民初的文言翻译是现代汉语书写语言的主要源头，因为是他们“并不借重现成的口语和白话，而是在书写语言内部进行毫不妥协的改造，由此最大限度地抻开了汉语书写的可能性”^[8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汉语欧化与‘五四’新体白话文学的生成研究”（编号：18CZW037）的阶段性成果]

[1][4] 严家炎：《“五四”新体白话的起源、特征及其评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1期。

[2] 参见宋声泉：《晚清学堂教育与文章变革——以周作人为中心》，《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3] 施蛰存：《导言》，施蛰存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第11集·第26卷·翻译文学集一，第25页，上海书店1990年版。

[5][34][59][66][76][81] 王风：《世运推移

与文章兴替——中国近代文学论集》，第119—169页，第143—145页，第167页，“前言”第2页，第8—11页，第16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6][7][19] 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第473页，第454页，第55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8][12][18][20][21][22][24][25] 《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734—735页，第738—741页，第741页，第729、736、742页，第696—697页，第734页，第751页，第741页，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注[12]原文有删减，不在文中另注明。

[9] 《周作人散文全集》误为2月15日，“油谷治郎七”误作“油谷治七郎”。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第1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0] 另可补充，1918年2月14日，蔡元培日记载“阅日本《大学评论》第二卷第一号”，附列感兴趣的篇名“《废娼运动之中心人物》”。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16卷，第49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1][46][48][58] 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第32—33页，第18页，第20页，第7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3] 不仅张菊香、张铁荣合编的《周作人年谱：1885—1967》（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未录，徐从辉新编的《周作人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亦未提及。

[14] 2月23日交，因24日休刊，延至25日发表。据1918年2月18日《北京大学日刊》载《日刊之改组》《日刊编辑部组织法》《日刊经理部组织法》等可知，蔡元培对校刊有绝对主导权，故译文能在第一时间发表。

[15]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16卷，第51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6] 详见窦坤：《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第80—88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17] 1917年9月25日，《时报》报道石田文学士携文库离京。胡愈之的文章《记莫利逊氏之藏书》载于《东方杂志》1917年第14卷第12号。

[23] 陈独秀：《文科学长致各教员公函》，《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5月13日。

[26][30] 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3卷，第13—18页，第476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7] 详见李希泌：《鲁迅与图书馆（1912—1919）》，《国家图书馆学刊》1979年第1期。

[28] 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

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第201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29][33][69]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卷,第46、106、270、280、393、415页,第313页,第28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1]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5卷,第495、309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摩理思”见《出了象牙之塔》,“摩理孙”见《思想·山水·人物》,均译自日文。

[32]本文所指“逐字译”是言其大体的追求,而非指每字必译。

[35]详见宋声泉:《鲁迅早期翻译活动与其新体白话文经验的生成——以〈月界旅行〉为中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侠女奴〉与周作人新体白话文经验的生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5期;《〈域外小说集〉生成前史之再考察——以〈玉虫缘〉〈荒矶〉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5期。

[36][38]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2卷,第161页,第147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7]上野陽一:「藝術翫賞の教育」,『心理研究』第3卷第13册,1913年。

[39]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3卷,第471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0][43][56]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9卷,第112页,第112页,第11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1]黑田朋信:「小兒の趣味教育」,『趣味雑話』,第35页,趣味叢書發行所1914年版。

[42]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第28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4]王敬轩:《文学革命之反响》,《新青年》第4卷第3号,1918年3月15日。

[45]W. B. Trites 著、周作人译:《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新青年》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15日。

[47][49]油谷治郎七:「廢娼運動の中心人物」,『大學評論』第2卷第1号,1918年。

[50]《进德会报告·北京大学之进德会》,《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3月16日。

[51]「北京大學の進德會」,『日支時論』第4卷第2号,1918年3月1日。

[52]《进德会报告·廓清会起于支那》,《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3月21日。

[53]「支那に廓清會起ろ」,『廓清』第8卷第3号,1918年。

[54]姚灯镇:《浅谈日语长定语的几种译法》,《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2年第5期。

[55]石田幹之助:「モリソン文庫に就いて」,『日支時論』第4卷第2号,1918年3月1日。

[57]详见陈力卫:《汉语欧化过程中的日语因素》,《文汇报》,2018年1月5日,第3版。

[60]《北京大学日刊》语体以文言为主,仅演讲和若干通知例外,甚至对演说的“述意”亦为文言。

[61][71]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

[62]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4卷,第48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3]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3卷,第394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64]刘复:《中国文法通论》,四版附言,群益书社1924年版。

[65]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14页,岳麓书社2010年版。

[67][70]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第95页,第100—10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8]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第16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2][78]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十六卷,第370—371页,第283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73]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1日。

[74]张寿朋:《文学改良与孔教》,《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15日。

[75]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卷,第23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77][80]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1日。

[79]张定璜:《鲁迅先生》,李宗英、张梦阳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册,第3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作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民族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何吉贤